三千年的璀璨文明
——尋訪伊朗建築遺迹

● 史　倫

天漸漸亮起，長途大巴在伊朗南部的山區開了整整一夜。醒來時，我已經來到伊朗西南部城市——阿瓦士（Ahvaz）的郊區。挺拔的椰棗樹從窗外零星閃過，石油探井上噴湧的火焰，映照着模模糊糊的晨曦。一層薄薄的輕霧罩在大地表面，泛起微微的淡紫，好像伊朗這片神秘的土地上，等待被揭開的面紗。這片被薄霧罩住的土地，距離伊拉克邊境僅有幾十公里，靠近波斯灣的盡頭，是遠古人類文明的起源地——兩河流域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因為緊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，這裏水源充足，土壤肥沃，曾經是兩河流域文明向東傳播的必經通道。在這一帶找尋建築遺迹，就是在尋訪伊朗早期的文明歷史。

為甚麼要專門去找建築？法國大文豪雨果（Victor Hugo）講過：「建築是石頭寫成的史書。」透過每一座建築自身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其所代表的文化，還能從中解讀出一段段歷史。穿過薄霧，我去尋找一座屹立至今超過三千年的大金字塔，從這裏開始，我藉由建築——這一獨特的觀察視角，踏上穿越伊朗的旅程，領略綿延三千載的璀璨文明。我在2017年5月18日進入伊朗，6月20日離開，一共三十四天①。

一　埃蘭與波斯：建築風格的融匯

在攝氏46度的高溫與烈日暴曬下，河谷盡頭晃動的地平線上，一座土黃色建築層層疊起，好像一座龐大的堡壘。「堡壘」頂上的黃土高高隆起，彷彿還未完工。由遠及近，漸漸看清層層基台四周被硬朗的磚砌包裹：一層層向上疊起，又一層層向內收進。這座古老的建築名叫喬加贊比爾（Tchogha Zambil）。直觀感受上，喬加贊比爾像極了歷史課本裏對於巴比倫空中花園的描繪，同時也有一些埃及金字塔的意象。只不過，唯一讓人感到格格不入的，是牆面上那些整齊砌築的磚塊，因為這些磚塊看起

來實在太新了，就像昨天剛鋪砌上去，讓人很難相信眼前是一座超過三千年歷史的建築。為甚麼會看起來如此簇新？難道是由於近些年對其過度修繕嗎？

事實上，這種建築的形式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經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。當時生活在幼發拉底河畔的烏爾人建造了一座「月神廟」，用一層層寬闊的基台來模仿山的形態，再將神廟高高建築於「山頂」。後來，生活在附近的埃蘭人借鑒了這種建築的形態和制式，建起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喬加贊比爾神廟，在金字塔形基台的頂端，供奉他們心中的神。

湊近去看基台四周那些「嶄新」的磚塊，總能在上面找到雕刻的楔形文字。其中有一處經由考古學家破譯，大意是：「我是埃蘭之王，是王中之王。」而如此精妙的細節是如何穿越歷史長河，未經損壞、完好如新地展示在現代人面前的？埃蘭人的統治範圍曾經涵蓋了今天伊朗西部的大部分地區，然而由於與不同政權文明相鄰，衝突一直沒停息過。在公元前640年，喬加贊比爾遭到亞述巴尼拔(Ashurbanipal)洗劫，此後被風沙湮沒。直到1935年，英國－伊朗石油公司(Anglo-Iranian Oil Company)在一次航拍中意外地發現了它，才使其重見天日。在乾燥的沙土掩埋下，三千年前的磚塊可以不受任何侵蝕，因此當沙子退去，建築形態依舊完好。

埃蘭文明不僅建造了磅礴偉岸的喬加贊比爾神廟，還締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化之一。位於喬加贊比爾西北大約30公里的蘇薩古城(Susa)，曾經作為埃蘭王朝的都城，堆滿了來自各國的奇珍異寶，這令周圍的一些政權垂涎不已。公元前六世紀，居魯士大帝(Cyrus the Great)率軍佔領了蘇薩，徹底推翻了埃蘭政權，建立起波斯第一帝國——阿契美尼德王朝(公元前550-330)。那是當時人類建立的幅員最遼闊、種族最多樣的龐大帝國。居魯士還重新擴建了蘇薩，來自各方的工匠也帶來不同的建築風格。在蘇薩遺址現存的柱礎上，還能夠清晰看到雕刻精美的蓮花和棕櫚束圖樣，這些都是埃及神廟的經典裝飾主題；不少柱身的凹槽和柱頭上的渦卷則又明顯源自希臘愛奧尼亞(Ionia)地區。

來自不同地區的建築風格還集中體現在居魯士對都城帕薩爾加德(Pasargadae)的建設上：埃及的柱頭，亞述、巴比倫的浮雕，還有從小亞細亞借鑒而來的石工技藝。在帕薩爾加德的宮殿區，一根屹立的方形石柱上保留了清晰的楔形文字：「我是居魯士，大王，阿契美尼德人。」作為波斯帝國的開國大帝，居魯士的陵墓也建於帕薩爾加德。這是一座由六層基台層層內收，再將墓室托起的石砌建築。從形制上看，頗能看出以喬加贊比爾為代表的兩河流域早期神廟建築的影響。

居魯士去世後，王位經其兒子岡比西斯二世(Cambyses II)等，最終歸屬大流士大帝(Darius the Great)。在都城帕薩爾加德西南方，大流士建造起一座專門用於禮儀慶典的城市——波斯波利斯(Persepolis)。波斯波利斯的入口是位於懸崖邊的兩段

階梯，像張開的雙臂。走上台階迎面的第一座建築被稱為「萬國之門」，今天只留下幾根高高的方柱。柱面上雕刻着守衛大門的牛身人面像。儘管浮雕的頭部已經殘缺，矯健的身姿和飽滿的體態還是可以從側面一覽無餘。在如此重要的方位建造「萬國之門」，作為整座儀典城市的總入口，展現着建造者敞開胸懷，迎接八方使者的好客姿態。

由「萬國之門」通向後面的一座方形大廳，名為阿帕達納宮（Apadana Palace），遺址上只能看到規整的柱礎和少數幾根立着的柱子。大流士曾經在這裏接見前來朝貢的各國使節，而「萬國來朝」的畫面則被雕刻在大廳後方的牆面上：來自埃及、巴比倫、亞述、呂底亞、粟特、印度、亞美尼亞等地的使者，帶來各地物產。

公元前331年，希臘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（Alexander the Great）來到波斯波利斯，他將這裏儲藏的金銀財寶作為戰利品統統運走，最後放了一把大火，燒毀了波斯波利斯的宮殿，就此終結了波斯第一帝國。亞歷山大的那把火，把波斯波利斯宮殿群裏所有的木質屋頂和門窗化為灰燼。由於石柱和石牆耐火，因此得以大量保留下來。眾多石刻浮雕中，有一片在殘垣高處的圖像讓人格外印象深刻：那是一隻展翅的飛鳥形態，羽翼向左右兩側水平伸開，而「鳥」的軀幹則是人像造型，人像頭戴圓冠，有濃密的頭髮和鬍鬚，手中攥着圓環。這樣的圖像名為「法拉瓦哈」（Faravahar），在距離波斯波利斯不遠處的崖壁墓穴上也有出現，那裏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家墓園。

二　建築與宗教信仰嬗變：從祆教到伊斯蘭教

（一）祆教與帕西人

再一次與這個飛鳥圖像——法拉瓦哈相遇時，我已經來到伊朗中部城市亞茲德（Yazd）。亞茲德城南有一座神廟，神廟的主殿是一座米黃色磚砌建築，門頭正中就是這隻展翅的飛鳥，而大殿的中央則放置着一盆熊熊燃燒的聖火。這座以聖火為中心的神廟，很容易讓人直接聯想到俗稱的「拜火教」。拜火教正式的名稱是祆教。三千多年前，生活在中亞的瑣羅亞斯德（Zoroaster）認為世界就是善神（光明神）阿胡拉·馬茲達（Ahura Mazda）和惡神（黑暗神）安格拉·曼紐（Angra Mainyu）之間的一場戰爭。人類必須站在善神的一邊才能接近光明，因此信徒要向代表光明的火焰祈禱。亞茲德的這座神廟，正是世界上僅存不多的祆教祠之一。門頭正中的



波斯波利斯遺址上的「法拉瓦哈」（史倫攝）

那隻飛鳥圖像，描繪的就是祆教裏代表光明與善的阿胡拉·馬茲達。長期以來，祆教在波斯廣為盛行。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後的波斯第二帝國又稱薩珊王朝(224-651)，就是因為開國君主阿爾達希爾一世(Ardashir I)的祖父是祆教神廟的高階祭祀——薩珊(Sasan)。他還把祆教奉為國教。

從亞茲德市區向北進發，一路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和荒山。有一處半山腰突然冒出一抹綠色，在一片土黃中間格外亮眼。沿着山路拾級而上，在一扇金色的大門背後找到了這片綠樹的成因：正是岩洞裏順着窟頂滴下的泉水，滋養了周圍的樹木。這裏名叫「恰克恰克」(Chak Chak)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祆教聖地之一。在波斯語中，「恰克恰克」的意思就是水聲滴答滴答。

七世紀初，阿拉伯人帶着剛創立的伊斯蘭教橫掃西亞。公元637年，阿拉伯人兵臨波斯首都城下，皇室成員大多在逃跑途中喪命。傳說中，只有一位波斯公主活了下來。她一路逃到這裏的深山，面對懸崖絕壁，公主回頭看到山下的追兵，懇請祆教光明神阿胡拉·馬茲達庇護。就在這時，大山奇迹般地裂開一條縫，讓公主藏了進去。然而，現實並沒有這麼美好，公主被阿拉伯人殺害了。今天在岩洞裏順着崖壁滴下的泉水，就像面頰上悲傷的淚珠，祭奠波斯第二帝國——薩珊王朝的衰亡。

此後的幾個世紀裏，隨着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化，愈來愈多的祆教徒改宗伊斯蘭教。當時的阿拉伯伊斯蘭政權對祆教徒的政策並不友好，拒絕改宗的一部分祆教徒被迫遷徙。他們為了延續自己的宗教傳統，渡海前往印度西海岸。為了體現族群的身份認同感，這些遷到印度的波斯祆教徒自稱帕西人(Parsi，又譯巴斯人)。此詞是由“Pars”(波斯)一詞衍生出來的。帕西人的歷史不僅是一段民族遷徙史，也是一段文化保存史。他們把古波斯的宗教傳統帶到印度，並在新的土地上延續了一千多年，成為連接伊朗與印度文明的重要橋樑。十七世紀起，英國殖民者在印度設立商館，同時熟悉波斯語、古吉拉特語和英語的帕西人成為東印度公司最重要的本地中間商；再加上帕西人熟悉印度洋航線，於是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不少遠洋商船的船主。到十八世紀，英國東印度公司打通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後，帕西商人紛紛隨商船湧向中國。而乾隆自1757年開始實施廣州一口通商，所有外商只能在廣州十三行交易，因此帕西人來到廣州，還壟斷了印度對華的香料、棉花甚至鴉片貿易。

祆教火種在波斯的土地上奄奄一息，由阿拉伯人帶來的伊斯蘭教逐漸成為伊朗的主要宗教。儘管波斯人紛紛改宗，波斯文化卻依舊被完好地保留下來。統治伊朗的阿拉伯人長期遊牧，並沒有自身成熟的建築技術和建築文化，因此他們只有依照波斯薩珊王朝的體系來建造宮殿和園林；而波斯帝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哲學、醫學、天文學成就也被傳承下來。儘管在阿拉伯人征服初期把阿拉伯語定為唯一的行政官方語言，波斯語卻依舊是民間日常交流的主要媒介，相應地，波斯語詩歌文學也得以保留；除此之外，波斯的重大節日、社會制度乃至官僚體系等，都被阿拉伯人在後續的統治中沿襲。

(二) 伊斯法罕與伊斯蘭教

由亞茲德向西前進200多公里，是伊朗歷史最悠久、最輝煌的城市——伊斯法罕(Isfahan)。十一世紀，塞爾柱突厥人來到伊斯法罕，把這裏作為塞爾柱王朝(1038-1194)的國都，從此開啟了波斯藝術、文學、科技的新篇章，也留下不少獨具風格的建築。

在伊斯法罕市中心，穿過集市(巴扎)的拱廊後，突然進入一片靜謐的區域：一重重柱廊層層疊疊向後伸展。柱廊通向的空間被一個巨大的穹頂籠罩，四周磚牆上是一圈圈連續的尖形拱券。未有任何貼面裝飾的磚砌結構，讓人感覺到一種原始且直接的力量。走出高大的門拱，來到方形庭院中，在這裏可以同時看到不同歷史時期的建設。這座名為聚禮清真寺(Masjed-e Jāmé of Isfahan)的大型建築群，不僅是伊朗現存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清真寺之一，也是研究伊斯蘭宗教建築演變的重要範例。其中建於塞爾柱王朝時期的部分雖歷經修繕，卻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。

到了薩法維王朝(1501-1736)時期，十六世紀末，阿拔斯大帝(Abbas the Great)希望按照《古蘭經》中描繪的天堂模樣來建造伊斯法罕。他在聚禮清真寺西南一公里多的地方劃定了一塊長方形區域，把這個範圍內的原有建築統統拆除，建成一座長560米、寬160米的大廣場，並將這座廣場命名為「國王廣場」(Meidan-e Shah)。順着集市的拱廊走進國王廣場，視野豁然開朗。修剪平整的草坪環繞着中央噴水池，兩排噴湧的水柱從兩側升起。孩童嬉戲，奔跑的馬車伴隨着歡快的銅鈴……儘管現已改名為「伊瑪目廣場」(Meidan Emam)，但「國王」的威嚴和氣度，依舊是這裏的主基調。

阿拔斯在國王廣場南端建造了一座清真寺，名為「國王清真寺」(Masjed-e Shah)，現稱「伊瑪目清真寺」(Masjed-e Emam)。走近清真寺的大門，視線往往會被拱頂裏一重重垂下的壯觀造型吸引。這種造型看起來就像岩洞裏的鐘乳石，被色彩華麗的瓷磚精巧包裹，繁複的立體構成和絢爛的幾何圖案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感。這種構造在建築學上被稱為「穆克納斯」(Muqarnas)。當仔細觀察，就能發現穆克納斯中所蘊藏的數理邏輯十分嚴密：一重又一重的小凹龕對大門的拱頂進行分解，重複編織起一套基於大凹龕的體系，又在形體的不斷交錯間進行着變化。用一個個基本的組成單元，不斷有規律地重複，實現建築形體和空間形態的轉折變化，使穆克納斯具有一種奇幻的視覺效果。

將一個完整的形體分解為許多細小的相似部分，在建築學上稱為「分形」。波斯建築師在建造中巧妙運用分形幾何的原理，實踐着伊斯蘭的世界觀和哲學理念。長期以來，伊斯蘭哲學家和神學家思考自然萬物、宇宙和真主的關係，他們認為物質、時間和空間都是由不可再分的細小粒子組成的。在這種理解的指引下，建築師也用「粒子化」的理念來建造清真寺。他們用小尺寸的磚塊替代巨大又沉重的石料，用精巧繁複的細節來消解體量龐大的建築形體，為建築賦予了獨特的精神屬性。

國王清真寺的主殿穹頂，距離地面足足三十多米。抬頭仰望時，看得

到飛進主殿的小鳥在穹頂下一圈圈翱翔；藍色馬賽克拼貼而成的基調，恰似一片天空。無論是建築高度還是庭院尺度，國王清真寺在在彰顯一座皇家清真寺的氣度，也難怪被稱為「伊斯法罕王冠上的明珠」。

遺憾的是，在今年的美以聯合空襲中，伊斯法罕的聚禮清真寺和國王清真寺受爆炸衝擊波影響，遭到嚴重破壞。大面積瓷磚脫落，大量帶有古波斯銘文的面磚無法復原。

(三) 基督教與宗教自由

然而，伊斯法罕並不完全是一座伊斯蘭教的城市。除了宏偉的清真寺以外，也能看到幾座外觀十分低調的基督教堂，比如旺克大教堂(Monastery of St. Amenaprkich [New Julfa Vank]/ Vank Cathedral)、伯利恆教堂(Bedkhem Church)。這樣的教堂主要集中在一個名叫新焦勒法 (New Julfa) 的社區，位於橫穿城市的扎因代河南岸。從外觀上看，旺克大教堂圓鼓鼓的磚砌穹頂與清真寺並無差異。然而只要走近，就能看到頂端那枚細小的十字架。教堂前廣場中間的噴水池還有人像雕塑，不同於伊斯法罕的大部分地區。仔細看，教堂周圍牆面上有一些六角星形花窗，還有幾座尖頂的鐘樓。相比之下，教堂內部空間呈現出巨大的反差感：四壁和天花上無處不是極盡絢爛的彩畫裝飾，《聖經》故事裏的人物被描繪在鑲有金邊的圖案間。

可是為甚麼在全面伊斯蘭化的伊朗，還會出現這樣的基督教堂？教堂的來由，還是與薩法維王朝時期一心要把伊斯法罕建成天堂的阿拔斯有關。阿拔斯是一個對建造工程精益求精的統治者，當他得知在大不里士 (Tabriz) 附近有一個名叫焦勒法 (Julfa) 的地方居住了不少能工巧匠，就不惜發動軍隊從那裏把工匠帶到伊斯法罕進行城市建設。建造工程結束後，這些來自焦勒法的匠人留在伊斯法罕。為了紀念故鄉，他們就把自己居住的社區命名為新焦勒法。這些匠人並不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，而是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。阿拔斯採取了寬容政策，不僅沒有強迫他們改宗，還特別允許他們擁有宗教自由，於是就有了我們今天在伊斯法罕看到的基督教堂。

有一句廣為流傳的波斯諺語：「伊斯法罕半天下。」意思是：「看過伊斯法罕，就等於看過半個世界。」這句話讚歎的，就是由阿拔斯親手締造的壯美都市。當時的伊斯法罕，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廣場，還有華麗的皇家宮殿、宏偉的清真寺、寬闊的林蔭大道……這些偉大的工程背後，多有來自焦勒法的匠人付出的心血。

三　古代住宅與現代首都：建築智慧與西方文明

伊斯法罕以北大約150公里，有一座名叫卡尚 (Kashan) 的城市。由於地處交通要道，這裏一直是重要的商貿中心。在卡尚經營絲綢、地毯和瓷器生意的商人積累了雄厚的財力，他們建造起豪華的住宅庭院，至今仍被譽為波斯傳統住宅建築的巔峰。

與傳統中式院落大多墊高地基的模式不同，從街道進入波斯傳統住宅

庭院時，通常需要往下走多級台階，因此總有一種前往地下室的錯覺。至於為甚麼伊朗人喜歡把自家院子建在地下，只要盛夏時節到當地感受一下就會明白：乾旱炎熱的沙漠地帶，地下空間的溫度明顯低於地上，因此更適宜起居。但是，在地下空間裏會不會感到憋悶？空氣循環問題怎麼解決？這從卡尚的城市風貌就能找到答案。放眼望去，卡尚老城的牆頭上林立着一座座造型別致的小塔，這些塔的造型與清真寺的宣禮塔迥異。每座塔的頂部都有細長條狀的通氣口，把高處新鮮涼爽的空氣捕捉進塔身，再引導進入下面的庭院和房間裏，從而驅散炎熱。這樣的塔狀建築物在建築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——「風塔」(wind catcher)，可以形象地直譯為「捕風者」。地下的空間加上風塔，還有庭院裏的水池，能夠大為提升居住體驗。

由卡尚繼續向北，來到現代伊朗的首都德黑蘭(Tehran)。這是一座城南與城北建築風貌截然不同的城市。城南是以茶館、集市為代表的傳統生活區，城北則是現代化的社區、購物中心和辦公大樓。從伊朗最高的建築默德塔(Milad Tower)俯瞰，規劃整齊的社區彷彿紐約曼哈頓的一處縮影：橫平豎直的街道，建築物以窄面朝向大街，修長的縱深，高高低低一字排開。二十世紀中期，巴列維王朝(1925-1979)積極擁抱西方文化，在城市建設方面，國王巴列維(Rezâ Pahlavi)不僅聘請美國城市規劃大師格魯恩(Victor Gruen)來編制「德黑蘭總體規劃」(Tehran Comprehensive Plan)，還邀請康(Louis Kahn)、丹下健三等國際著名建築師主導地標建築項目。當時巴列維王朝的開放程度與國際化，直白地體現在德黑蘭的城市面貌上。

德黑蘭市中心有一座二層的紅磚小樓，是曾經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。1979年伊斯蘭革命期間，保守派大學生衝進這座大使館，把五十二名工作人員當成人質，扣留長達444天之久。今天，這座小樓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館——間諜巢穴博物館(Den of Espionage Museum)，展示着當年美國人在這裏使用的間諜設備以及秘密談判的房間。那些構造複雜的間諜設備被掀開外殼，露出密密麻麻的內部零件，就像被抓現形後遊街示眾的犯人。一些展櫃中掛着當年反抗示威運動的黑白照片，憤怒的民眾舉起標語，堵塞在大使館門口。這座小樓所承載的，是伊朗社會的重要轉折點：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起，巴列維世俗君主制被徹底終結，全球唯一的什葉派政教合一伊斯蘭共和國被建立起來。伊朗終結了對西方世界的依附，走向截然相反的另一極。老百姓的世俗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：女性在公共場所被強制要求戴頭巾；原本正常營業的酒吧、賭場、夜總會被關停；學校裏的教材被重新編寫，刪除西方人文內容，着重強化伊斯蘭歷史與倫理教育……

這場轟轟烈烈的變革，讓整個伊朗社會從擁抱西方的開放與多元一下子進入封閉保守，一場政治運動不僅改換了政權，還令百姓生活面目全非。今天在伊朗旅行，時刻都能感受到禁忌重重，也經常聽到伊朗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，幾乎每一位英語流利的伊朗人都會告訴我他們的心願：到別的國家生活。

回到德黑蘭城南的集市拱廊裏，香料、銅器、地毯、首飾琳瑯滿目，顧客熙熙攘攘；無盡的拱廊一重又一重，彷彿一條神秘的時空隧道，從遙遠的古代繁榮中蜿蜒而來，又通向不明的未來。

四　結語

三千年的波斯文明，歷經王朝興替，宗教更迭，戰火與重生從未停止。然而，散落在伊朗大地上的建築遺迹，就像露天博物館裏的一件件珍貴展品，鮮活地訴說着這片土地的歷史。從喬加贊比爾的興建到蘇薩的繁榮，從帕薩爾加德的誕生到波斯波利斯的輝煌，從亞茲德的延續到伊斯法罕的鼎盛，每座城市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，每座建築都鐫刻着文明的記憶。建築不僅是空間的營造，更是文明最長久的載體。當王朝消逝，帝國化作塵埃時，真正留下來的，是人們對自然的理解、對信仰的追求。尋訪伊朗的旅程，不僅是在閱讀一部波斯建築史，更是在閱讀一部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影響與借鑒、延續與傳承的史詩。



香港銅鑼灣禮頓道善樂施大廈外牆上的「法拉瓦哈」（史倫攝）

有趣的是，在今天香港的銅鑼灣，還能在禮頓道的一座大樓上看到伊朗古遺迹上反覆出現的飛鳥——那幅代表祆教光明神阿胡拉·馬茲達的圖像，像圖騰一般懸掛於善樂施大廈的裙房外牆上，這裏是祆教徒在香港的主要活動場所。一千多年前，帕西人從伊朗的亞茲德遷徙到印度，一部分人在鴉片戰爭後前往廣州經商。後來廣州貿易制度衰敗，這些帕西商人便來到營商環境更加自由的香港。渡海小輪與香港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九龍渡海小輪公司（天星小輪前身）就是由信仰祆教的帕西人創辦經營的，輪船煙囪上的五角星正是代表阿胡拉·馬茲達的光。而赫赫有名的香港大學，則是由帕西商人、慈善家摩地（Hormusjee N. Mody）爵士創辦的。作為全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，祆教的火種從伊朗發源，又跟隨帕西人的遷徙到達印度孟買，然後來到香港繼續流傳。而來自伊朗的文化對世界的影響，絕不僅限於天星小輪和香港大學等事物。或許，正是這些我們本以為遙不可及的地區和文化，在歷史上不同時期一次次遠道而來，不斷碰撞、融合，才共同塑造了我們所熟知的日常與當下。

註釋

① 本文部分內容出自史倫：《速寫本上的世界：探索東西方建築的環球之旅》（南京：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，2025），嗣經修訂。

史　倫　獨立建築師、策展人。